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任 曲青山

重庆 改革开放 口述史

徐塞声 艾新全 主编

党史出版社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任 曲青山

重庆改革开放口述史

徐塞声 艾新全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改革开放口述史 / 徐塞声, 艾新全主编.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12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

ISBN 978-7-5098-4935-4

I. ①重… II. ①徐… ②艾… III. ①改革开放—历史—重庆 IV. ①D61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0329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海平

复 审: 吴江

终 审: 汪晓军

责任校对: 龚秀华

责任印制: 谷智宇

责任监制: 贺冬英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字 数: 221千字

印 张: 15

印 数: 1—2050册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4935-4

定 价: 35.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197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曲青山

编委会副主任 吴德刚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荣刚 刘晓晨 苏红军 杨建伟 张志仁

胡庆国 徐塞声 高新民 程中才

《重庆改革开放口述史》

主编 徐塞声 艾新全

副主编 田姝 袁仁景 孙迪

目 录

- 关于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回忆 廖伯康 / 1
- 重庆计划单列与综合改革的由来 辛文 / 48
- 重庆计划单列往事 陈之惠 / 55
- 回忆重庆计划单列 刘黎平 / 70
- 重庆商业“四放开”改革 张文彬 / 76
- 重庆应对八九十年代改革的重重困难 孙同川 / 81
- 我所经历的巴县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张文彬 / 95
- 重庆80年代的整党整风和干部工作 秦玉琴 / 100
- 我亲身经历的重庆直辖 蒲海清 / 105
- 我所了解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推进过程 甘宇平 / 115
- 重庆直辖前后的体制划转工作 吴家农 / 120
- 维护稳定是做好筹备重庆直辖市工作的关键 赵海渔 / 132
- 忆重庆直辖 窦瑞华 / 140
- 黔江地区与重庆直辖 税正宽 / 144
- 我见证了巴蜀分家 辜文兴 / 146
- 献给直辖市的礼物：解放碑步行街 余远牧 / 152

- 我与直辖前后的重庆人大工作 陈之惠 / 159
- 直辖带来了重庆文化的大发展 王洪华 / 163
- 直辖后重庆城市建设管理的巨变 于学信 / 177
- 直辖前后的涪陵 胡健康 / 187
- 重庆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再就业工作纪实 吴家农 / 193
- 四川三峡经济联合发展委员会老领导访谈录 甘宇平 吴家农 马述林 吴忠海 / 203
- 三峡大坝175米水位的由来 廖伯康 / 223
- “移民先锋”忆三峡移民 冉绍之 / 229
- 后记 / 234

关于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回忆

廖伯康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重庆在全国首先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这是改革开放中，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其目的是为全国城市及工业改革探路。当时安徽和四川的农村改革经验已在全国推开，城市改革提上了党和国家议事日程。重庆由于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有幸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我直接参与了这项社会实践。这段人生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20多年后还历历在目。现趁身体尚好，脑子清楚，作一个回顾，供关心和研究党史和城市改革的同志参考。

半月内两次任命

1983年我在中科院成都分院当副院长。春节刚过，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把我叫去，宣布一项中央任命，由我出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

消息来得突然，我稍作思索后说：“到成都任书记我没有思想准备，但组织决定我服从，希望给我一周时间，让我通过非正式渠道摸下成都

市的干部情况，一旦宣布了，我就不容易听到真实情况了。”汝岱表示理解，同意了。一星期后因为中央已决定温江并入成都，为了解温江干部情况，调研时间改为两周。

两周后我去汝岱办公室对他说：“现在可以宣布了。”汝岱却说：你不去成都了，中央决定调你去重庆，担任市委副书记。

我再次感到突然。怎么会两周内两次任命，而且还没到任就改任？何况我与重庆还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我在重庆工作时间比较长。1948年上半年，因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我奉中共中央上海局之命，从上海带一批党员和新青社社员回重庆，加强重庆学运，以后就一直待在重庆，新中国成立后搞共青团工作。1962年时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因为直接向中央反映四川极左造成的恶果而得罪了某些领导，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到重庆市第一建筑公司当混凝土工。“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重庆市建工局革委会副主任，粉碎“四人帮”后调到中科院成都分院。之所以调成都，就是因为尽管我出来工作了，但政治上还留有尾巴，一些诬陷之辞并未彻底肃清，在重庆我不便于工作。现在不但要我回重庆，还要进入领导核心，我对到重庆好不好开展工作心里没底。

汝岱说：“对你的任命实际上就是起到了清除影响的作用噻。”

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况且组织已经作出决定，作为共产党员不当讲条件，更主要的是，从两次任命看，显然重庆的工作比成都的重要。于是我问：“何时去？”汝岱要我最好第二天就走，说中央催得急，因为重庆马上要进行一项重大改革，薄一波带着20几位部长已经到了重庆，四川省委的刘西尧和何郝炬也带着20多位厅局长去了，中央、省、市三级在一同搞方案，市委书记王谦年龄较大，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位熟悉重庆的人协助他。

事后据人透露，我这次调动，是薄一波到重庆后根据重庆干部推荐，经向中央反映后，中央临时作出的决定。

1983年3月我到重庆时，薄一波以及部分部长已经回京，搞方案的工作已近尾声。这项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进行，天天与

北京保持着热线联系。

本来我同王谦说好，给我三个月时间摸情况，这三个月里我不公开讲话，结果我到重庆不足 20 天，市文联开一个会请市委领导出席，王谦约我一起去，他在会上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说：“今天我不讲话，给你们介绍一位新书记，许多同志认识他，他就是廖伯康同志，下面让伯康同志给我们讲几句！”台下哗哗鼓掌。我走投无路，仓促走到了前台。这个小插曲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试点工作的紧迫性。

既然不得亮相，我就索性放开讲，由于刚从科分院出来，我就从科学与文学的关系讲起，这是个新视角，也符合潮流，结果赢来了热烈掌声。

为什么要搞城市改革试点

那时重庆是四川省辖市，四川的改革在全国起步较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四川省委书记随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出访东欧，所见所闻，感触很深。

东欧各国由于处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前卫地带，较早接触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在我们“文革”后期，他们就对二战后兴起的带有很重苏联色彩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进行了反思并着手改革，中国代表团访问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改革已进行到一定程度，其核心是放权，让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充分结合，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较快。

省委领导感慨不已。归途中向华国锋提出，让四川先行一步（那时还没有正式提出改革开放这个概念），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激发农民，特别是盆周山区贫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让山区贫困农民尽快解决温饱问题；二是给国企一定自主权，调动其生产积极性，提高效率 and 效益。华国锋同意四川搞点探索。当时还要求将在四川的军工企业就地下放，交地方管理，华国锋没有同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成为主旋律，四川因为早有考虑，所以动得快，势头猛。改革首先在农村搞起来，包括把自留地由每人三分增加到七分，这在全国是第一家。四川农业生产很快复苏，一度成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样板之一。企业方面，全川先在重钢、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家工业企业进行扩大经营自主权改革试点，以后又增加到100家，进而又扩大到商业企业，再后来工业、商业共有几百家企业搞扩权，效果不错，产值、利润都提高了。这个经验被逐步推广到全国。

四川自己并不太满意，因为这些改革仅限于企业，局限在“点”上，不能连成“片”，无法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综合经济实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为了研究、解决发展经济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央新建一个机构，叫中央财经委员会，由陈云挂帅。陈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首先派出七个小组到各地调研，其中一个组由刘明夫带队，到了四川。刘明夫“文革”前就是国家计委副主任、陈云的老部下，复出后改行搞经济研究，担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因为重庆搞扩权改革的企业较多，所以重庆是他们调研的重点。

刘明夫“文革”中靠边站，已经多年没出来了，看了重庆他吓了一跳。在他记忆中，重庆区位很好，一头连大西南，一头连长江流域，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抗战期间是陪都，解放初是西南首府，其工业基础也很强，抗战中集中了中国的主要骨干工业企业，建国后中央在“大三线”投入1200多个亿，其中1/3在四川，四川的大头在重庆，全国80万台军工设备，重庆就占了30万台，经过逐年积累，重庆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产能极强，其工业固定资产占四川1/5，占西南1/7，工业总产值占四川27%，占西南20%。但刘明夫看到的重庆，却是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菜园坝火车站又脏又乱，全市还有四五百万平方米抗战房（抗战期间临时盖的非永久性建筑），还在用晚清的机器，财政收入一年不足10亿！向省里交6亿后，每年手头剩不了多少钱，维持简单再生产都捉襟见肘，基本上不能搞技术改造，很难扩大生产规模。

当然刘明夫也清楚，10亿元的年财政收入并不真实反映重庆产能，

因为还有一批大中型国企的产值和利润未计算在内。这些企业属于“条条”（中央和省），它们的固定资产占了重庆工业“半壁河山”，它们生存于重庆社会，但游离于重庆体制之外，它们用重庆资源，但产生的价值基本与重庆无关。

刘明夫感叹不已。他说，国际上都知道重庆是大工业城市，哪知道在体制内重庆被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只是四川省的一个地区，本质上与万县地区、涪陵地区没有区别。

回到成都，在向四川省委汇报调研情况时，刘明夫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感受，提到了“城市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概念。他认为，城市是生产力最集中的地方，一个城市必须是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有几个特殊功能，即经济的集散功能、吸引功能、辐射功能和服务功能，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实行的分省制，源于元朝，注重了政治和军事的作用，忽略或抑止了城市在经济上的功能发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他主张对现行城市体制进行改革，让城市能打破条块界限统一管理 and 协调企业，并由城市发展带动一定范围的区域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省委领导非常赞同刘明夫的观点，极力支持他向中央汇报，同时萌动了先在四川按这个思路进行改革的念头，其想法是把省里有的经济权力，包括在重庆的省管企业都给重庆，让重庆成为独立的经济单元，充分利用其特殊功能，加快发展速度，促进全省经济发展。

有个重要背景不能忽略。小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视重庆在全川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1954年重庆划归四川省时，他特别叮嘱四川最高领导李井泉“必须高度重视重庆”，要李井泉“每年应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重庆工作”。1978年视察四川时，小平同志就指出重庆的计划可以单列。

在“中心城市”观点的影响下，四川省先后多次专题研究，打算赋予重庆更多的权力和职责，把农村改革成果引向城市和更广泛领域。但遇到的阻力不小。当时中央和四川在渝企业共有137个，它们分属中央22个部和省里24个厅，一些省级行业管理机关“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抱走”，不赞成企业下放。有次开会研究企业下放问题，一位厅长

借口上厕所，在楼道里偷偷给北京的主管机关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地说：“你们赶快出面干预哟，不然就要（把企业）放下了。”

但省委领导态度很坚决，坚持要放。更重要的是，“城市是经济发展中心”这个概念被带到了中央。几年后，这个概念出现在我国“六五”计划中，国务院关于“六五”计划的报告强调：“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

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更明确提出：“以城市为中心，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组织各种经济活动。”

由于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何况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性很强，所以在酝酿“六五”计划时中央就有所考虑，要先进行城市改革试点。

为什么挑选重庆搞试点

“六五”计划公布后，为了探索城市改革路子，国家体改委安排沙市、常州进行城市改革试点。为什么选这两个城市？国家体改委认为，这两个城市以轻纺工业为主，企业规模不大，即使改革失败，对国民经济大局也影响不大。

这时，国务院收到四川大学一位教师的来信，信中说，我国国有小企业有机构成低，人的作用大，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大企业有机构成高，人的作用小，对国民经济影响大，不宜扩大自主权。这封信既呼应了国家体改委关于先在中小城市进行试点的观点，同时也对四川进行的大中型国企扩权改革的前景提出质疑。

随后，此信转到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让专家论证。这个“中心”直属国务院领导，其成员都是经济学家，由德高望重的薛暮桥担任总干事。学者们对信中观点反复讨论，结果多数人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大企业有机构成高，人的作用更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大，更应

当扩大自主权，推动改革大局。但对于进一步怎么改，最后没有定论。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位学者决定到首钢搞调研。

两位学者都是老革命，其中蒋一苇是川东地下党老同志，曾与红岩英烈陈然共同办《挺进报》，“文革”后担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另一位叫林凌，也是老地下党，不过活动范围在北京，“文革”后任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活跃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第一线，薄一波同志曾打算将其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一次偶然机会，蒋、林碰在一起，因观点相近成为学术伙伴。

他们有个共识，认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实践性极强，无法从上到下做好规划再搞，只能自下而上地冲，他们称为“撞击反射”。基于这个思路，他们很关注一线企业。

他们选择到首钢调研，缘于三个因素，第一，首钢是当时国家确定的八个试点企业之一；第二，当时首钢本身对改革有强烈要求；第三，林凌解放初参加了对首钢的接管，并在那里当过工会主席，熟悉那里情况，还有老战友在首钢。这最后一个条件很重要，因为他们到首钢的调研工作纯属学术行为，没有政府背景，需要人脉资源。

首钢欢迎他们。双方愉快合作了40天，形成了一个叫“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点是，以肯定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为前提，承认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生产单位的相对独立性，在企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计划后允许其自主进行商品生产，并在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上缴指标后，允许其将余下的利润自主用于技术改造和分配。现在回过头看，这个方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这个方案却相当前卫，它在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上较之以前跨进了一大步，对全国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方案出来后，两位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在操作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方案中提出的部分扩大企业经营权和分配权肯定会引发企业主管部门不满，进而形成阻力，同时，实施这个方案离不开社会环境，因为生产资料供应及产品销售都得在社会中进行，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深入进行大型国企改革，必须有一个相适应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要有企业所在地的城市改革与之配套。

他们把这个观点写进了调研报告，同时在报告上加了个附注：“我们认为选择一个像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很有必要。常州、沙市情况比较简单，重庆比较复杂，但正因为复杂，才能通过试点，探索一些解决复杂问题的途径，例如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如何纳入统一的经济机制，如何建立经济中心等等，都只能在重庆这样的城市进行试点。”

蒋、林的调研报告于1982年4月14日脱稿，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们越过首钢主管部门和北京市，直接交到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手中，请马洪呈送国务院主要领导。马洪赞成蒋、林观点，随蒋、林报告附了一张纸条：“关于重庆是否也同沙市、常州一样，作为综合试点城市，也请考虑。”

四天后，国务院总理批示：“在重庆搞综合试点，原则同意。请体改委议一下。”一周后，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也作了重要批示。

至此，重庆正式进入国家决策层视线。但不是最后定案，因为四川的态度和重庆的想法还未同中央对接。

蒋一苇和林凌觉得这已是很好的结果了，非常高兴，两人商量后，立即南下，向重庆市委、市政府通报消息，并打算作进一步调研，搞一个符合重庆情况的可操作性方案。市委市政府当然欢迎，马上抽调人力，配合蒋、林工作。调研人员兵分三路：蒋一苇守北京，随时了解高层信息；一拨人赶赴沙市、常州，总结经验教训；林凌则留在重庆准备材料。

林凌在重庆会仙楼宾馆待了一个多月，拿出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首次使用了“中心城市”这个概念，意指大城市是众多周边小城市的中心，大城市带动小城市，小城市带动周边地区，从而形成一大片经济区。重庆是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他认为，这是在3000多年历史演进中自然形成的。

对为什么选择重庆进行改革试点，调研报告除介绍了重庆的区位优势和历史地位外，重点强调了五条理由：第一，强调了重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认为搞好重庆市的改革，既可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

性经验，也有利于发挥国防工业的作用；第二，强调了重庆是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广泛的城市之一，有很好的基础条件；第三，强调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重庆的关怀和希望；第四，认为重庆是全国唯一不是省会的特大城市，容易在经济上同省里分开；第五，提出正因为重庆容易在经济上同省里分开，所以可以在重庆实行“点”内“试”，就是在操作时将“点”封闭起来，在“点”内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在试验成功之前，其他城市不得仿效。

不久，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这是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全国党代会。大会彻底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次会上，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命题。中国改革开放，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地铿锵迈步。

会后，全国掀起“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创新局面”热潮，重庆市委市政府按照十二大精神，拟订了一个实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送四川省委、省政府并转报党中央、国务院。

四川省委、省政府也在积极学习、贯彻十二大精神，当然支持重庆搞改革。之前一个月，刘西尧已作为省委代表，与先期到达重庆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一道，同市委市政府领导进行了多次沟通，达成了一些原则意见，重庆的上报方案就是围绕这些原则意见形成的。

但真正收到重庆上报的方案后，省委还是很慎重，1983年1月6日下午至7日上午，省委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进行研究。参加扩大会议的有省委新老常委，省政府新老正副省长，以及有关部、委、厅、局的负责同志。

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会上回忆了一件往事。那是1966年他在山东当第一书记时，一天毛泽东将他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叫去漫谈，话题渐渐转到管理企业问题，江渭清建议省不管企业，统统由市管，毛泽东说好，然后问谭启龙的态度，谭启龙说除保留几个大企业外都可以下放，毛泽东批评道：“你思想不解放。”

谭启龙在省委扩大会上感叹：“（建国）30多年来的经验证明，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是不行的，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制约。”

省长鲁大东也开明，肯定了重庆方案，只是强调要解决军工企业出路，他说：“试点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贯彻了军民结合（指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试点会搞得更好。”

三天后，即1983年1月10日，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向中央、国务院呈送报告，建议中央、国务院尽快批准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20来天后，标注“秘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3）7号”文件发到全国，标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意见》”。这份发至省军级的文件指出：“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决策。认真搞好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都具有重要意义。”

7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充分发挥重庆的经济和地理优势，打破现行的行政区划，打通重庆对海外的直接联系，加强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形成以重庆为依托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内外贸易、科学技术、金融事业等综合发展的开放型经济区。”

《重庆方案》作为附件随同7号文件下发。《方案》提出改革试点主要在六个方面进行，分别是：

1. 发挥重庆资源和设备优势，不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还要打破行政区划，促进重庆的钢铁、铝加工、烧碱等企业与川西、贵州地区的有关企业协作、联合，互通有无。

2. 发挥重庆机械工业优势，已有的机电产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并不断搞好升级换代，同时积极开发新的机电产品，更好地为各行各业的技术改造和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3. 发挥重庆地区农业和已形成的轻纺工业优势，推进经济区内的农业现代化事业，保证农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并与周围地区广泛进行协作、联合，大力发展特色轻纺产品，供应市场。

4. 发挥重庆科技优势，把先进技术吸收进来，扩散出去，推进国防科技向民用转移，沿海和国外科技向内地转移，科研成果向生产领域转移。

5. 发挥重庆水陆交通枢纽作用，积极创造条件开辟重庆到沿海各城市和港澳等地的航线，进一步发挥重庆作为西南物资集散中心的作用，促进内外贸易大发展。

6. 发挥重庆常规兵器工业优势，积极为国防现代化作出贡献。

中央将《重庆方案》作为7号文件的附件，显然肯定了这个方案。中央认为：“认真搞好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中央还给了一些特殊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有四条：第一，同意重庆在计划体制、企业管理体制、流通体制、财政税收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以及工资奖励制度上率先进行改革；第二，赋予重庆相当于省一级经济权力，国家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第三，原则上中央和省在渝企业下放市管；第四，扩大重庆面积，永川地区与重庆合并，实行市带县体制。这些带有突破性质的政策，为重庆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实际上是为重庆搭了一个特殊平台。

7号文件下发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又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明确要求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重庆改革，主管全国体改工作的国务委员薄一波也在京召集部分中直机关负责同志开会，动员各单位拿出实际行动支持重庆。这个会是春节前开的，节后薄老就率领几十位同志到重庆，督促落实。

四川省委刘西尧带的几十号人前后脚也到了重庆。加上重庆党政主要领导以及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中央、省、市三级，总共一二百人，在薄老直接领导下，关起门搞了一个多月，反复酝酿，想得很细，24个政府职能部门各有一套独立的操作方案，所有文本摞起来足有半人高。

按照薄老在潘家坪招待所作动员时的说法，十二大后，中央在改革开放上重点抓了三个点：“以上海为中心，搞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区规划，